

茶座

总第十五辑 2009 第一辑

主编 王兆成 执行主编 王学典

历史学家茶座

孟祥才：“文革”中“群众专政”亲历记

申晓云：蒋介石与他的外交亲信

孙言诚：郭沫若和秦始皇

丰家骅：柳亚子晚年的“牢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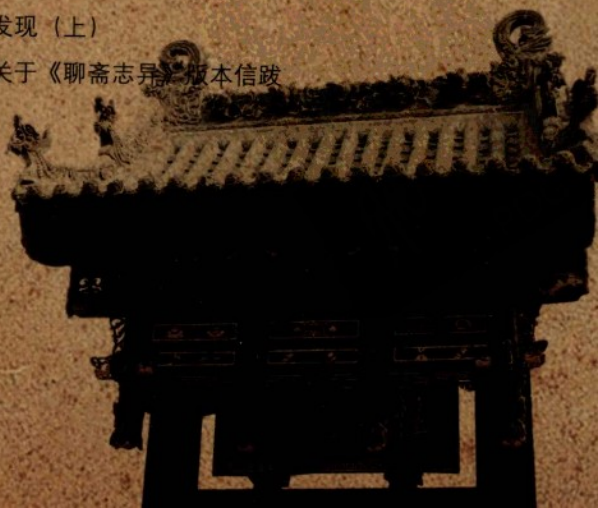
毛佩琦等：明清易代论辩

龚咏梅：历史学家不应只钻故纸堆——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访谈

王振忠：徽州文书的再发现（上）

徐庆全：康生、齐燕铭关于《聊斋志异》版本信跋

山东人民出版社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体现：《南都繁会图卷》（局部）

这幅图卷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南京商业买卖的盛况。整幅画面绘制了一千多个职业身份不同的人物，一百多个商店的招牌牌匾，充分反映了明代城市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东西两洋货物俱全”，这正是明代海外贸易的真实写照。

见正文第 32 页。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TEAHOUSE FOR HISTORIANS XVI | 历史学家茶座15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张其成：主

主 编:王兆成

执行主编:王学典

学术助理:扬 眉

编委会:

于 沛	王 和	王子今	王春瑜	王曾瑜	邓小南
牛大勇	仲伟民	刘志琴	刘 平	朱政惠	苏双碧
李伯重	李振宏	陈春声	张国刚	杨念群	杨 豫
辛德勇	张耀铭	宋德金	赵世瑜	徐思彦	徐秀丽
徐庆全	黄朴民	阎步克	彭 卫	葛兆光	葛剑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家茶座.第15辑/王兆成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209-04724-1

I.历... II.王... III.史学—丛刊 IV.K1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4309 号

出 版 人 金明善

责任编辑 王海涛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制作 刘冉冉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编辑部电话 0531-82098014

购书电话 0531-82098021(宋先生)

邮发代号 24-50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16 开本(172×232 毫米) 10 印张 16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4.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给农历新年注入更多的信仰成分 王学典

春日

今年圣诞、元旦、农历新年扎堆过，这一情形多少年轮回一次，笔者不知道，但笔者却从中感受到了洋节与本土最盛大的节日之间的反差：洋节越来越红火，而春节越来越寡然无味；洋节仿佛是青少年甚至儿童的节日，而本土节日则似乎主要由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在过。联想到今日的青少年将是明日的中老年，笔者瞻望本土节日的前途，真是不寒而栗！

不能否认，我们许许多多甚至全部本土节日，都是农耕社会的产物，都是农耕文明的组成部分，都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只有把农历新年放到延续了数千年的以敬天法祖为传统的血缘宗法村社共同体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看到这些节日存在的功能与意义。如今，农耕社会已基本解体，工商社会正取而代之，与此相适应，传统的村社生活方式亦正让位于城市生活方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统节日如何延续，可以说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这一挑战的实质在于：我们正从一个短缺社会走向一个丰裕乃至过剩社会。以往“过年”甚至几千年来“过年”，都是改善生活的代名词，都意味着穿新衣戴新帽，我们对新年的想象更多地和“过好日子”、吃好东西相关。现在，当短缺为丰裕所取代，生活天天像过年一样时，“年”的魅力、吸引力当然也就相应减弱了，“年”的存在甚至也变得可有可无了。

与中国的“过年”更多地与吃穿等感官活动相关相反，西方的“圣诞”则更多地和信仰、心灵、精神相关，更多的是一种“超越”性质的活动，所以，“圣诞”好像不存在“过时”的问题。我们能否使过年也更多地成为一种“信仰”活动？问题在于，我们能给农历新年注入何种信仰成分？笔者这里的建议是：鉴于农历新年所固有的源远流长的祖先崇拜内容，我们能否把一年一度的祭孔活动挪到春节来举行，使祭祖与祭孔合一：祖，可以是我们每个人的血缘祖先，也可以是我们共同的血缘祖先——轩辕；孔，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祖先、文化祖先。为千秋万代着想，为重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着想，祭祖祭孔能否合并到春节来举行的问题，应该提到整个民族的议事日程上来。

目录

卷首语

卷首语

名家访谈

历史现场

史学沙龙

明清易代论辩

- 036 张海英 晚明悲剧的启示

- 044 白新良 关于清朝历史定位的思考

人物春秋

- 050 孙言诚 郭沫若和秦始皇
059 申晓云 蒋介石与他的外交亲信
067 顾 农 鲁迅在北洋军阀教育部

学坛述往

- 078 邹逸麟 “八马同槽”时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一个学生的回忆
083 陈 勇 “钱宾四最欣赏的学生”——严耕望与钱穆(上)
094 丰家骅 柳亚子晚年的“牢骚”
100 宋德金 一名编辑眼中的邓广铭先生

历史评论

- 107 胡 戟 历史学应该是社会减灾学
112 李鸿宾 学术大师悬想

公私档案

- 119 王振忠 徽州文书的再发现(上)
129 郑会欣 王云五与1946年商务房产接收
132 徐庆全 康生、齐燕铭关于《聊斋志异》版本信跋
144 李世红 所谓“运动不实材料”

域外新知

- 149 洪 霞 二战后英国的民族关系

读史偶记

- 156 弯 弓 萧条异代不同时——读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掌故钩沉

- 158 陈仲丹 曾国藩治眼病

【新到书】

-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新到书 820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新到书】

-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上)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新到书】

-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新到书】

- (上)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新到书】

-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新到书】

-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新到书】

-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刻本 820

历史学家不应只钻故纸堆 龚咏梅*

——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访谈

编者按：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对中国十分友好，多次访问中国。他与他夫人合著的回忆录不久将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回忆了他们丰富生动而又曲折的学术人生。伊格尔斯教授在下面的访谈中，畅谈了他的经历和他对历史学及为人等方面的看法。

问：作为一位有世界性影响的学者，您的犹太人身份似乎对您的一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您的家庭于1938年10月以难民的身份从德国逃亡到美国。1942年当您已经身处美国的时候，您首次读到了有关大屠杀的报道。即使您并不是一名大屠杀的受害者，大屠杀是否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事件深深地震撼着您，促使您成为一名严肃地对待人类历史、认为人类记忆不该忘记历史的历史学家？是哪些动因让您决定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据我所知，您出生于商人家庭。为什么您对历史和历史学有一种特殊的兴趣？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包含着几个不同的问题，涉及我的身份认同，我与大屠杀的关系，以及我怎样成为一名历史学家。

对问题的第一个部分的回答是：我始终从文化和宗教的意义上觉得自己是

* 龚咏梅，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犹太人,但犹太人身份只是我整个身份认同里的一部分。我的犹太人身份并不是我的学者工作的中心部分,这个身份不是由大屠杀(我和我夫人都侥幸逃脱)所塑造的,而是由更早些时候,即1933年至1938年我作为一个犹太儿童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我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我在纳粹德国经历的那些对犹太人的歧视,强化了我当时自己是犹太人的意识。当然,大屠杀深深地震撼了我。我无法想象我曾经认识的体面得体的德国人怎么会支持纳粹,而且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养成了一种很强烈的正义感,而且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反对非正义。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我为此非常难过,当时就在我就读的德国公立学校里声明反对这一侵略行径。我为大屠杀的暴行所深深震撼,也为世界其余地方的人如何袖手旁观而听其发生而震惊,就像我为他们后来如何对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对目前发生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大屠杀听之任之而感到震惊一样。不久前海登·怀特在上海回应我说,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卸下过去的包袱,要生活在当下。当然,我们必须生活在当下,但是我们关于过去的记忆(这种记忆记载着过去的一切可怕的方面)对于形成我们的现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我能够返回德国了,因为过去的两代德国人,比那一代作恶的德国人,更加愿意诚实地面对他们的过去。

说到我的犹太信仰,我早年就已经放弃了正统的犹太教,但现在我认为自己在宗教上是一名自由主义的犹太教徒。作为自由主义的犹太教徒,我更多地保留了犹太传统中那些我认为积极的因素,包括它的正义感,而放弃了犹太教中大部分仪式性的约束。我参加那些比较自由的宗教仪式,在那里男人女人完全平等,传统的希伯来祈祷仪式并没有完全被放弃,但是被赋予了能为所在国理解的内容。

再多谈一点我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比犹太人更广的范围上,我是一个欧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中欧人,与德语世界的文化有密切关系。犹太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对德语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拥有一种非常个体化的身份。在我整个一生中,我赏识德国文化,但也认识到它的那些危险的局限性。今天我更加容易认同于今日的德国,在发生了那些可怕的事情之后,它已经摆脱了反民主的和军国主义的传统。这是一个崭新的民主的德国,一个更好的、但绝不是完

美的社会。因此我接受了恢复曾被纳粹剥夺的德国公民身份。我也有美国人身份。1938年从德国来到美国的时候,感到就像突然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与德国相反,我非常感激美国的更大程度的开放,它的民主;但与此同时我很快就意识到美国社会的另一面,特别是它的种族主义,后来发生在麦卡锡时期的反自由主义,以及近年来想要主宰世界的企图。至于我的犹太身份,我觉得自己是犹太人,但不是从民族的意识上认为如此。——因此,我不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我相信犹太人应该继续在移民的过程中对文化作出贡献。我的犹太教徒身份对我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我对犹太教、德国、美国的认同是批判性的,对其中每一个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层面都有所认识。因此我的身份认同超越了国家和宗教的界限;也许称我自己为世界公民可能又走得太远,但我总是去发现与其他文化的亲近关系,在亚洲、南亚次大陆和非洲,我都有好朋友。

现在我解释一下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我如何成为一名学者的问题。当我还是在德国的一个孩童的时候,我受到了青年运动精神的深刻影响。这部分是出于反对我们父母的资产阶级特征。这种反应有很大的浪漫主义成分在里面。我之所以参加犹太青年运动,就是决心要离开父辈们的那种与办公室和商业打交道的世界。对我们来说,理想社会就是农业的、共产主义的集体农庄吉布兹,这种想法最后被证明是幻想,甚至根本上是危险的。在回答下面的问题时,我会解释我最后是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的。

问:您在高中阶段,对世界上的语言,比如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伯来语、世界语,甚至汉语,都有很高的兴趣。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您能否谈一谈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语言教学,您是否认为自己从这种教育中获益匪浅?

答:在我幼年时候很早就已经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1940年我13岁的时候,我参加了“现在联合运动”(Union Now Movement,后来改称World Federalists即“世界联邦主义者”,在战后号召民主国家的世界联盟)并成为积极分子。这引发了我对世界语言,比如世界语这种可以服务于国际交流的语言的兴趣。我开始着手要发明一种比世界语或其他人工国际语种有更简单的词汇和语

法结构的国际语言。最后这些人工语言都没有成功,我的语言也没有机会像英语那样成为世界语言。我开始广泛地涉猎大量的语言,罗曼斯语、俄语、古拉丁语和希腊语,甚至还有你提到的汉语,尽管我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我学了希伯来语,也学得不大好,是作为我的宗教教育的一部分。那个时候语言教育在美国的学校里开展得并不好。我在高中学的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其他的语言都是我自学的。

问:1943年,当您在列治文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读书的时候,您是基督教青年协会(YMCA)的积极分子。您修了法语和西班牙语双学位,但也选修了大量的哲学方面的课程。您只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拿到了本科文凭(17岁),然后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当时您认为这所大学更接近德国大学体制,因为它给学生更多的自由。在您的自传中您提到这是一个非常天真的想象,大概是因为您的世界语言计划破产了,然而您还是被德语系接收了。您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在观念史方面。在芝加哥大学,您写了一篇硕士论文,题为《海涅与圣西门》。对圣西门的兴趣似乎是您学术生涯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当时您同时还热衷于社会和政治活动。饶有趣味的是,当时该校的汉斯·罗特费斯教授竟然告诉您说:“你对历史学没有理解力,不应该去追求博士学位。”从这些早期生活的信息中,我理解您的思想中存有一种政治立场。那是什么呢?这种政治立场与您的历史学研究有关系吗?如果有的话,是如何相关的呢?当时您是如何看待圣西门的?您后来改变了这些看法了吗?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包含了大量的非常不同的问题。首先谈谈我1943年参加基督教青年协会的激进主义的问题。我当时并非活跃于基督教青年协会,而是活跃于由基督教青年协会发起的一个跨人种学生组织。首先说一下背景:1938年10月,我随父母来到纽约,头三个月里,我被灌输了美国式民主。1939年1月,一个犹太人资助的组织把我们重新安置在弗吉里亚州的列治文市,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份工作,虽然对我父亲和我们的住房来说报酬少得可怜,因为在纽约不可能找到工作的机会。列治文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中曾是联邦的首都,那里至今还到处留有联邦过去的印记。当我们到达时,我为那里的种族隔离感到震惊。在列治文所有设施都是隔离的,包括我进的学校。列治文大学当时是

一所与非常保守的和种族主义的南方协会(Southern Association)过从甚密的很保守的学校,由于我住在列治文,它就是我能进的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一个跨人种的、包括白人和黑人学生在内的团体,即列治文大学校际委员会。该委员会每月会在市里碰头——我们不能在列治文大学校园里会晤——有大约三百个黑人和白人学生会出席,这是一种新的经历。我当时积极开展招募学生的工作。1944年夏我到芝加哥大学开始我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本意是要学习语言学,但是那里所教授的语言学与我所期望的有很大不同,不是从历史上对语言做比较的研究,而是分析的语言学路径,这对我的世界语言计划没什么用处。所以我就进了德语系。我意识到我的计划是浮躁无益的,转而日渐对观念的比较史感兴趣。我最喜爱的德国诗人海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顺便提一下,他也是犹太人。1831年他离开德国,从此流放于法国。1844年他认识了刚从德国流亡到巴黎的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带着他的夫人燕妮,还有他们的小孩。海涅和马克思成为好朋友,马克思对海涅的主要诗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提供了帮助。这首诗挖苦批判了德国的政治和国家主义。我的论文里从来没有涉及马克思,但是反过来我谈到了海涅在1831年到达巴黎不久后,与法国社会主义团体“圣西门主义者”的联系。我对它的同情是对具有民主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同情,但是我很快发现“圣西门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有多么的独裁。1945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后,我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习了一年,在这所学校里有许多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难民身份的学者任教。我一边在一家制衣厂打工养活自己,一边在这所学校学习社会学和哲学。1946年秋我返回芝加哥大学,进入文化史跨学科委员会攻读博士学位,我的主攻方向是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思想史,涉及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史、哲学、文学和宗教等领域。我之所以决定博士论文写作有关圣西门主义的政治哲学,并非因为我同情他们,而是因为我批判他们。他们认为现代文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希望通过抛弃启蒙理想而回到社会主义理论所接受的天主教的反革命的思想中去,以达到恢复秩序和权威的目的。圣西门主义并非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但他们使我对历史哲学产生了兴趣。汉斯·罗特费斯在我的求学过程中只是扮演着一个非常边缘的角色。我修了两门他讲授的19世纪德国史的研究讨论课。我在发言中就对他的

极端民族主义和反民主的观点表示非议,并且搞不明白像他这种人为什么会离开纳粹德国。实际上在他最后被迫离开纳粹德国之前,他与纳粹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之所以能够与纳粹那么紧密地合作,是因为他还没有暴露他的犹太血统。

问:您参与了很多政治活动,比如小石城案、南方民权运动、芝加哥反越战运动,等等,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这些斗争中您总是与维尔玛(伊格尔斯夫人)在一起。你们是在为平等和自由而战。您是否认为,作为历史学家,您肩负着改变世界的责任?您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什么?您是否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只处理历史文献,要远离政治,这样才能做到没有偏见?人际间的接触和对社会问题的干预,是如何与您的学术活动相关联的?

答:这又是一个综合的问题。维尔玛和我相识于六十多年前,那时我们在芝加哥大学,从此没有分离过。虽然我们在性情方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智识爱好,都是很不相同的两个人,但是我们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我们并肩工作。1948年我们结婚,1950年我们接受了坎帕萨斯州小石城的一所黑人大学的职位,我们也住在黑人社区。那时小石城不再是旧南方,而是开始意识到情况应该改变。我们到那里不久以后,我成功地让我的那些黑人学生被允许进入白人公共图书馆。因此,最重要的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所属的小石城协会,就邀请我担任了他们协会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在我的任上我负责一些研究和计划,最后形成了一套措施,使得白人公立中学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开始被废止。在每一步上,维尔玛都帮助了我。尽管在这座南方城市里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种族紧张状况,那些与我们分享同样观点的白人,从来也没有孤立过我们。所以我们居住在一种人种混合的环境中。至于你问我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什么的问题,从上述回答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我,还有维尔玛,都坚定地相信存在着对一切社会都行之有效的人类尊严和自由的价值。所以我们参加了民权运动,也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我们参与了反越战的运动。我们不信仰暴力对抗,而信仰和平手段。在战争中我为几百名反战人士提出过建议。我总是感到在我的学术工作中有一种伦理承诺。那种认为历史学家只应当关注文献、要避免政治立场的看法,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历史写作

都建立在某些价值设想之上,历史学家可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这些价值假设仍然塑造着他的史识,并且为他的历史写作抹上色彩。历史学当然要求严肃的研究和诚实。一切历史学家都受到哲学的和伦理的假设的指引,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无需历史真实。过去历史学家常常过多地服膺于支持种种历史神话,而且历史学曾被用于独裁国家,支持那些很少有事实基础的意识形态。历史学不能超然物外,可又要是诚实的;历史学一定不能变成一种宣传的工具。至于人际间的交往,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学问超越了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界线。

问: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对您影响最大的学者是谁?比如马克斯·韦伯、恩斯特·特爾慈?他们是如何影响了您?您是怎样吸收这些社会学家或别的思想家的思想和方法的?

答: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不只一个学者影响了我。我阅读了大量的社会学和哲学的作品,并且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一位思想家完全地符合我的立场,虽然他们在智力上帮助了我的发展。我不认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是具有决定性的。我不仅曾经学习过韦伯和特爾慈,而且在我的《德国的历史观》中从批判的角度详细地讨论了他们的思想。韦伯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试图将自然科学的逻辑与人文科学的逻辑连接起来。我个人感到最要感激的学者是我的老师,詹姆斯·路德·亚当斯(James Luther Adams),一位神学家,他深深地沉浸在20世纪早期的德国思潮之中,这其中包括马克斯·韦伯、恩斯特·特爾慈(Ernst Troeltsch),以及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我把我的《德国的历史观》献给他,而没有献给我博士论文的导师路易斯·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因为亚当斯最接近、符合我关于具有积极的社会良心的学者楷模,而戈特沙尔克,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法国启蒙运动的知识。他警告我应该专注于我的学术事业,以免我的社会激进主义损害我的学术生涯,因为这大概是影响到了我的学术生涯。

问:1962年您写过一篇文章,比较19世纪德国和美国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理解是如何的不同。可否请您概括地谈一下这种不同看法?

答:在我刚完成的一章《19世纪职业学术的思想基础》(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Nineteenth-Centu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的草稿中,我

更广泛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一章将发表在丹尼尔·沃尔夫主编的《牛津历史编纂史》(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一书当中。在美国,兰克被理解为科学史学之父。他本质上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他认为,基于经过批判性检验过的文献,他可以把历史写成“实际发生的历史”,避免任何哲学的预设或道德的判断。兰克历史写作的思想背景被误解了,他植根于德国唯心论。德国唯心论哲学塑造了他的历史学,超越了尊重事实的精神,而美国历史学家正是因为认为他尊重事实,才在1885年他去世之前不久,授予他新成立的美国历史学会的首位荣誉会员资格。

问:历史学家可能在有限的假定和学说之上建立一门经验社会的或历史的科学吗?您如何看待卡尔·波普尔?

答:是的,只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卡尔·波普尔曾经认识到这一点,但也对轻易下结论发出了警告,他强调一切具有科学有效性的命题都必须用它们可以被证伪的形式来表达。波普尔和亨佩尔制定的覆盖定律的问题是,它不容易用于解释构成人类历史的那些目的和意志,这些目的和意志无法用覆盖定律设定的因果关系术语来加以理解。波普尔思想的另一方面是对的,他警告历史学的思辨哲学以及这些哲学所服务的政治目标,但我不认为他对所有的国家干预或计划的彻底拒绝是正确的。

问:据我所知,您在史学研究上走的是比较的和国际化的路径,您与王晴佳合作完成了一部关于全球史学的书。您可以谈一谈关于这本书的一些情况吗?您认为编撰一部完整的全球史和全球史学是否可能?

答:我们尝试研究18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和非西方历史思维和编史的交互作用,当其时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为人知。我们对西方化的影响以及对它的抵抗感兴趣,也对非西方史学传统的存在及其力量感兴趣。一部完整的史学的全球史是可能的吗?我的回答是,史学的全球史是可能的,但完整的史学的全球史,可能性要小得多。

问:您曾经谈到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及其对历史写作的重要性。对此您可以解释一下吗?您是否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仍然是有生命力、仍然有用的一种重要的思想传统?